



分类号 G258.6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1.03.004

一个大写的人 ——回忆我与庄守经馆长的交往

□朱强*

2021年2月24日中午,我正在首都机场边看手机边候机,一条微信传来:“各位亲朋好友:我老父,庄守经,已于二月二十三日晚7:25分仙逝!……”仿佛脑子里“轰”的一声,饶是早有心理准备,此刻一时也难以接受。就在春节前,我还看到过朋友转来的视频,其中庄馆长尽管面容消瘦,嗓音嘶哑,但仍面带微笑,以坚定而有力的语气预祝大家新春快乐,幸福如意,并表示继续与病魔抗争并战而胜之的意志与决心。然而,他还是走了……

去年国庆期间,我曾去庄馆长家里探望过他,当时虽知他再次罹患重病,但看上去并无大碍,只是比之几个月前又瘦一些,但气色、精神均还好。他向我简略介绍了病情和治疗方案,表示目前换了一种药,效果还可以。随即转问我的情况,我也说了一些近况,转达了吴晞等人的问候,知其后还有他的两位中学老同学要来探望,担心累着他,我便很快告辞。岂料这竟是我见他最后一面。待寒假回京时,他已身陷病房,除非至亲,旁人不得探视。2月11日,我曾通过手机打电话问候,但接通后只听到“喂喂”两声,电话就断了,猜想可能是不方便,随后我发了一短信:“我是朱强,寒假回北京了,在此给庄老拜个早年!祝新春喜乐安康,牛年大吉大利!”

机场广播登机了,我稳定心神,给如上手机发一信息:“惊悉庄老仙逝,谨表沉痛哀悼,并请李老师节哀保重!”飞机起飞了,我的思绪也随着起伏,与庄馆长多年来交往的情景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

回到深圳后,刚开学走不开,只好托我老伴和小女在参加告别仪式时,代为献上一瓣无尽心意。这次馆里召开庄馆长追思会,我应邀参加,要追思与庄馆长之过往,岂是三言两语、短短一二十分钟得尽?思忖再三,不妨以我人生中几个重要节点得庄馆长相助为例,一窥庄馆长品德之高尚和为人之真诚。

一、庄馆长开启了我的事业之门

我是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图书馆学系1977级学生,1981年底,临近毕业,系里让大家填毕业分配意向。因我是家中独子,只有母亲一人,自然希望毕业以后回到家乡,以便侍奉老人。表格交上去后不久,负责分配工作的系总支书记黄老师找我,说你们班有三位江苏来的同学,但只有一个分配到江苏的名额,你是否考虑先留在北京。并且告诉我,有一个新成立的机构,叫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图工委)秘书处,是属于教育部的,挂靠在北大,你不妨去那里工作,将来如果实在想回江苏,从这边调回去也方便。我同意了,于是懵里懵懂地成了图工委秘书处(办公地点为北大图书馆的214室)的第一名正式报到的工作人员。

* 作者简介:朱强,1982年1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被分配到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简称图工委)秘书处工作。1987—1998年任图工委副秘书长。1990—1993年6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助理兼自动化部主任。1993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1994年8月—1995年7月,为美国伊利诺大学东亚和太平洋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1999—2012年任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秘书长。2002年9月—2005年6月,任深圳大学城图书馆馆长。2008年1月—2017年6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荣获“2012中国图书馆榜样人物”称号。2013—2018年,任教育部高校图工委主任委员。2018年9月以来,任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图书馆馆长。

ORCID:0000-0001-6842-0712, 邮箱:zq@lib.pku.edu.cn.



现在想起来,我能到秘书处工作,应该既有黄老师的推荐,也有庄馆长的首肯。

初到秘书处,尽管我在大学四年学了不少图书馆学的课程,毕业实习也是在北大图书馆,但高校图工委却是一个新生事物,秘书处是干什么的,应该怎么干,我一无所知。不久后的一天,由北大图书馆借调在秘书处的王世儒老师交给我几盒录音带,说这是老庄最近出去开会所作的一个报告录音,你给整理出来(当时我们214的人对于年长者一般都是在姓前加个“老”,老王、老庄、老肖,等等;同辈年轻人则直呼其名,可见当时风气之民主,领导之平易)。我接过录音带,花了一个多星期把报告整理出来,交给了老王。庄馆长又亲自执笔对这篇文章作了一些修改,后来摘要发表在甘肃省的学术期刊《图书与情报》上,我还分到了十几块钱稿费。这是我平生第一笔稿费,对于当时每月工资只有56元人民币的我来说,已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但更重要的是,正是在整理录音的过程中,我反复聆听了庄馆长关于高校图书馆现状、高校图书馆的职能和使命以及关于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分析和思考,全面了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的制订过程,了解了1981年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的背景、成果及其重要作用,从而认识了所从事工作的意义,激发了对高校图书馆事业的热爱,由此而走上了一生从事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之路。

二、庄馆长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

我在入学前就有了女友,大学毕业工作后第二年成了家,后来有了女儿,这样就形成了两地分居。又由于我和妻子均为独生子女,双方的老人都要照顾,我在北京工作,一年一度的“探亲假”时间有限,妻子在家工作,上有老下有小,负担就很重。起初坚持了几年,到1987、1988年时,孩子逐渐长大,老人日渐衰老,家庭的矛盾开始突出,“走”还是“留”,成为我十分烦心的问题。调回家乡工作,只动我一个人,牵扯面较小,但我内心舍不得已经日益倾心的图书馆事业;而把家迁到北京,一动好几口人,以我当时的身份地位,几无可能。出于此,家里都希望我能调回去,并开始联系当地的工作单位。恰在这时,国务院搞机构改革,一些同事认为图工委趁着国家教委机构改革,如果把秘书处搬到国家教委,甚至成立一个专门的司局来主管高校图书馆,可能更有利于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当时文化部设立了图书馆司,主管图书馆工作)。后来国家教委果然设立了一个司局级的机构,叫教材与图书情报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教图办),下设教材处、出版社管理处、图书情报处,并代管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等。当时图工委秘书处有8个编制,还有几位临时工作人员,很显然,机关里的一个处是容纳不了那么多人的,一定是有人留下,有人去国家教委。于是,图工委秘书处的所有工作人员都面临着“走”与“留”的问题。

我因于1987年底(或1988年初)借调至国家教委人事司职称改革办公室,协助做高校图书馆职称的相关工作调研和文件起草,在教图办成立后,自然就成了图书情报处的工作人员,每天骑着自行车从北大宿舍去西单附近的国家教委办公大楼,风雨无阻。一方面,觉得这样很辛苦,也不知何时是个头;另一方面,家里经常催促我尽快拿定主意调回去。于是,内心的天平逐渐向调回去偏移,初步落实了工作单位。就在这时,某天教图办开会时宣布了国家教委人事司的任命,肖自力为图书情报处处长,我为副处长(当时庄馆长已不再兼任图工委秘书长,由肖任秘书长,我任副秘书长),随即人事部门通知,让我回北大转人事关系。我回北大找了庄馆长,谈了我的心理矛盾,表示并不想去机关,准备调回老家。庄馆长表示理解我的心情,也认为我并不一定适合机关工作,但建议我还是留在北大,一方面,秘书处正在安排我利用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项目资助出国深造,另一方面,在北大工作比回老家会有更好的发展,他还表示会想办法解决我的两地分居问题。我接受了庄馆长的意见,放弃了去国家教委,而是继续留在北大,但出国深造的事则由于阴差阳错,连续两年都没办成。不过在庄馆长想方设法下,我妻子于1989年初被借调到北大后勤部门工作,孩子入幼儿园借读,一年多以后又正式调入,并落实了户口,终于在北京安了家。

三、庄馆长引领了我的成长之路

我在图工委秘书处期间,参与了几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包括1983年开始的全国高校文献资源现状调查及其后的高校图书馆文献共享方案研究、1987年的第二次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的会前筹备和全程会务



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修订为《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的全部讨论和文字工作等。在此过程中,庄馆长和秘书处其他老同志的言传身教和放手使用,使得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年轻人很快成长起来,迅速独当一面,在各地高校图工委和各高校图书馆中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9年下半年,国家教委机构改革基本定案落实,图工委秘书处的同事们走的走、留的留,留在北大图书馆的我担任了馆长助理兼自动化部主任一职。初到北大图书馆就担任这样的“要职”,我心里是有点打鼓的,对于能否做好工作并无把握。因为在此之前也曾多次参与过关于北大图书馆自动化发展的规划、计划的讨论,任职之前庄馆长也向我介绍了一些自动化部的具体情况,了解到北大图书馆虽然是国内最早开展计算机应用研究的高校图书馆之一,却由于内部意见不一致,始终走不出自动化的第一步。庄馆长给予我充分的信任和极大的鼓励,让我多听大家的意见,多向其他馆学习,大胆地去做。在庄馆长的直接领导下,我几乎与自动化部每个人进行了谈话,了解大家的想法,也听取了全馆各部门相关领导、同事的意见,并走访了一些兄弟图书馆应用计算机的部门,最终确定了利用引进的小型机开发自动化集成系统的技术路线。此后带领自动化部,在全馆各部门配合下,用了一年多时间,开发了国内第一套大型集成图书馆系统PULAIS,又用差不多两年时间,在各个部门落地应用,基本实现了图书馆业务流程的计算机处理。

随后我重点参与了新馆的筹建工作。北大自1952年搬入燕园,很长时间内一直以原燕京大学图书馆为主馆,1973年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动工修建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单体图书馆,1975年投入使用,师生普遍称其为“大馆”。到上个世纪80年代时,因藏书越来越多,逐渐蚕食了阅览空间,迫切需要再建新馆。庄馆长从1986年就开始谋划新馆建设,因经费困难始终不能启动。他动员了同事、校友等一切社会资源,希望能获取海外资助解决经费问题。终于在教育部港澳台办公室的支持下,1992年底安排李嘉诚先生到访北大,参观了大馆。当时为解决阅览座位短缺,在大馆南北天井内分别用彩钢板搭建了临时阅览室,冬无暖气、夏无空调,环境很差,但依然坐满了埋头苦读的莘莘学子。李嘉诚先生看到这种状况深有感触,表示要捐助北大建一个新的图书馆。于是我们开始了新馆需求和建设方案的讨论,许多人起初赞成另行择址建馆,经多方调研和考虑,从未来发展和使用便利的角度,庄馆长最终拍板了新老馆连接一体的方案,在此基础上,由我执笔起草了设计任务书。1994年中,第一笔捐款100万美元到账,我们迅速启动了设计方案招标,又经过上上下下的讨论,选定了清华大学设计院的方案。此时庄馆长已经离开了馆长岗位,但新馆很快于1996年动工,并于1998年百年校庆前夕投入使用,实现了庄馆长的夙愿。

从我开始到图工委秘书处工作,后转至北大图书馆任职,直到庄馆长卸任,十多年的交往中,我们之间既有上下级的关系,又有亦师亦友的关系,还有长辈与晚辈的关系,这种非同一般的关系一直保持着,直到庄馆长仙逝。从庄馆长身上,我学到了他注重调查研究、实行民主决策、讲求团结协作的工作方法;也看到了他全心全意投入图书馆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平易近人、与人为善的品格,淡泊名利、谦虚简朴的作风。庄馆长深刻地影响了我、激励了我,我也自觉不自觉地以庄馆长为榜样,在后来担任北大图书馆领导职务的过程中,先后取得了一系列成绩:规划设计了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英文简称CALIS)一期建设方案,主持了2002年、2015年《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的两次修订,实施了图书馆人事管理制度和业务组织架构的改革,组织了北大图书馆庆祝110周年的系列活动,并为全国的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这些在相当程度上都得益于和受教于庄馆长的培养、指导和帮助。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庄馆长是除了我的家人以外,这辈子对我影响最深、帮助最大的人。换句话说,庄馆长于我,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嗟呀,斯人已逝,而精神不朽。庄馆长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100871

收稿日期:2021年6月2日

修回日期:2021年6月6日

(责任编辑:王波)